

前记

二十多年前，有位老朋友偶然和我谈起：“中国的字典，历来尚无人写为专书来介绍，读者是需要这方面的知识的。你不妨写一本来论述一下。”我考虑他的意见很有道理，就写成《中国的字典》一书，于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1962年又应《知识丛书》编辑委员会之约，撰《中国古代的字典》，次年由中华书局出版。为了避免两书内容的重复，即和商务印书馆商妥，不再印行《中国的字典》。但原来《中国的字典》论及的十几部近代字书，却没了着落，可是这些书为大家所常用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应该加以介绍。因此我就考虑另写一个小册子，谈谈古今常用的字书，以适应读者的需要。恰好1963年春天《人民教育》月刊编辑部约我为中学老师们写一些介绍字书的文章，于是我把古今常用的字书，分别类型，共写十题，先交该刊发表，后又补充

内容，撰成《常用字书十讲》，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原《中国的字典》里谈《中华大字典》《辞源》《辞海》《辞通》《联脰字典》《汉语词典》《同音字典》《词诠》《古书虚字集释》，以及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《金元戏曲方言考》等十一部近代字书的材料，已均辑入这十讲之内。

《中国的字典》和《中国古代的字典》，都带有一些史论的性质。《常用字书十讲》则着重论述有关古今常用字书的基本知识，并举例具体说明其有何用处与如何用法，为较偏重于实用的工具书，和前两书的写法不同。

《中国的字典》只印过一版，流行不广。《中国古代的字典》印过两次，《常用字书十讲》则印数较多。但后两书在十年动乱后亦俱未再版。在三书中，以《中国古代的字典》较为人所注意，屡有读者来信，询问何时重印，或至书店寻购旧本。1978年香港中国语文学社曾将此书与《常用字书十讲》影印收入所辑《语文汇编》第十四辑、十五辑中。闻港方其他书店也续有影印《中国古代的字典》者。广西《辞源》修订小组，以觅此书不得，曾自行刻印数十部，以供参考。嗣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周策纵教授所撰论《说文解字》的专著，亦列《中国古代的字典》于后附之参考书目内。雅意虚怀，示学术之无畛域。近年国内研究辞书之风渐盛，撰文论述古代字

典、词典者，时见各地报刊，颇多佳作。亦偶有举例发凡，略同拙著，展卷依稀，似曾相识者；甚且有钞撮《中国古代的字典》为数万字大文连续发表，因被目为专家者。于此足征凡事皆以开创为难，拙著粗疏，不过垦荒在先，聊供一时填补空白而已；而乃承读者不弃，谬相称引，以是既感且愧，故尽两载之功，篝灯命笔，以《中国古代的字典》为基础，或增饰旧章，或补充新意，撰成《中国字典史略》一书，以副读者之望。此书起战国、秦汉至近世，共分七章，既依时代先后为次第，复以体例相近为类别，纵横交错，以见演变之迹。《中国的字典》与《常用字书十讲》之内容梗概，亦略具于斯。顾历代字书，存佚均夥，挂一漏万，自所不免。兹编所述，亦仅粗举纲要，略示源流，研讨未深，评鹭或失，读者正之。

解放后，辞书编撰，已入新纪元，当另为史传，故不论列。

一九八一年九月 刘叶秋书于北京

第一章 绪论

第一节 名称·类别·作用

（一）名称 字书—字典—词典—辞书

字书本指解说文字形音义的著作，即后来所说的字典。这一名称，早已有之。《魏书·江式传》说江式撰集字书，号曰《古今文字》；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书证》也谈及字书：“西晋以往字书，何可全非，但令体例成就，不为专辄耳。”可见“字书”作为解释文字的著作的泛称，在南北朝时已经通用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一著录有佚名的《字书》三卷、十卷两种（今俱失传），这又是以“字书”为书名的专称的。

历代史志于有关文字训诂音韵之书，统归小学类，不

立“字书”的名目。直至清代的《四库书目》，始于小学类中分训诂、字书、韵书三种。以“字典”为书名的，《康熙字典》是第一个。清人所说“字典”，就专指这一部书。但中国古代讲文字训诂的著作很多，大都既解单字，亦释复词。因此，从前大家把它们一律称为字书，并不分辨什么叫字典、何者为词典。

自从近代产生了“词典”（或“辞典”）这个名称，字典和词典才相对地有了界限，字书、字典也不再作为某一部书的专称来用。而一般群众所说的字典，却往往包括词典，因为现在的字典大都兼收语词，词典亦皆以单字为词头；二者之间始终有不可分割的关系，不过解字释词，重点各异而已。本书称《中国字典史略》，即取“字典”二字为大家所习用、熟知，易于接受，而于字典、词典两类，仍然分别叙述，兼指时则沿用“字书”这一传统名称。

至于近来以“辞书”一词来代替“字书”，我以为也很好。言之成文为辞，较“字”“词”的含义丰富得多，不仅可以包括讲字词语句的字典、词典，连各种类型的词典（如人名词典、地名词典等）以及一般的百科全书，皆能兼收并蓄，范围更广。

(二) 类别

中国的字书，源远流长，种类很多。见于著录最早的一部字书是《史籀》十五篇，相传出于周宣王时太史籀之手。秦汉人所撰字书，也有好几部，但大都失传。现存的字书以讲训诂的词典《尔雅》为最古。西汉末扬雄辑录汉代方言俗语的词典《方言》，东汉许慎以“六书”解释文字的字典《说文解字》，刘熙以“音训”释词的词典《释名》，也全是中国的字书的先河，为后代字书的发展，奠定了基础。此后到魏晋南北朝时产生了韵书，如魏李登《声类》、晋吕静《韵集》。隋唐人亦续有撰著，惜书俱亡佚。现存的韵书，以宋人所编的《广韵》为最古。这类书虽以审音辨韵为主，也兼讲文字形义，实际是字书的一种。

概括说来，中国古代的字书可以分为三大类：

第一类是《说文解字》派讲文字形义的字典；

第二类是《尔雅》派讲训诂的词典；

第三类是《广韵》派讲音韵兼及文字训诂的韵书。后出的多种多样的字书，都是由这三大系统发展演变而来。

(三) 作用

字书是工具书中重要的一种，为阅读时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，但古今对它的看法却大有不同。

古人对识字，是特别重视的。周时儿童八岁入小学，就学六书。汉代太史试学童，能识九千字以上的，才能作小史^①。读字书，就是识字的一种主要方法。魏晋南北朝人已注意从《尔雅》中吸取有关字词和其他方面的常识。自唐开成间刻石经起，《尔雅》一直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。《说文解字》也早就受着特殊的重视，唐人把它与晋吕忱的《字林》一齐列为士子的必读书，应“书学”考试的，即须考《说文》《字林》。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上卷说：“凡书学，先口试。通，乃墨试《说文》《字林》二十条，通十八为第。”后代许多人治经学，亦往往借古字书为门径。据说清代的学者戴东原（震）少时就是经塾师指导，先后阅读《说文解字》《尔雅》《方言》等书，始通经义的。

^①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古者八岁入小学，故周官保氏，掌养国子，教之六书，谓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，造字之本也。汉兴，萧何草律，亦著其法，曰：太史试学童，能讽书九千字以上，乃得为史。”

今天我们当然不能像古人那样迷信这些古字书，但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，作为一种工具来适当利用，还是必要的。阅读古籍，可借以探讨文字训诂；研究古汉语，可从中找到材料；于古代某些社会情况，字书也常有侧面的反映。例如我们看到《尚书·舜典》中“班瑞于群后”一句，想进一步了解“班”字的含义，查一下《说文解字》卷一的“珣”部，有“班”字的解释：“班，分瑞玉，从珣刀。”原来两块玉连在一起的叫作“珣”，中间加一个“刀”，表示分开的意思，这就是“班”的形义。由此更加清楚“班瑞于群后”是指“分瑞玉给诸侯”了。《说文解字》所引古书，往往与今本文字不同，也有参考价值。如卷一“人”部的“𠂔”字解释：“𠂔，威仪也。从人，必声。《诗》曰：威仪𠂔𠂔。”按今本《诗经》中“小雅”的“宾之初筵”作“曰既醉止，威仪𠂔𠂔”。𠂔、𠂔不同。其通假关系，值得研究。其他如《尔雅》的“释詁”对作“始”讲的词，并列了“初、哉、首、基、肇、祖、元、胎、俶、落、权舆”十一个；《方言》对“鸡”的不同名称，举出了“鸛𪗇、割鸡、𪗇”三个；使我们知道许多同义词，加深了对古汉语词汇的理解。凡是有关文字的形体构造、古音、古训、引申、通假以及古今词语的变迁等问题，都可以靠字书来帮助解决。

至于近代的字书，则涉及的范围更广，内容更为详备，凡在阅读时遇到不认识的字、不懂得的词，不了解的成语、故实、古代的典章制度和人名、地名等，一般皆能从字书中找到答案。研究文史，想找有关材料，亦往往可由字书内得到一些线索。如有人对明清的科举制度不太清楚，误以“副榜”为“举人”。查一下商务印书馆新修订本《辞源》第一分册的“副榜”一条，可知元代会试，正式录取的名列正榜；另取若干，名列副榜。明代会试、乡试皆有副榜：会试副榜，给一些下第的举人以做官的机会；乡试副榜，准做贡生，称为副贡。清代则只乡试有副榜，可入国子监肄业。这一条对副榜为何，作了清楚的说明，后面还注明参阅清俞樾《茶香室四钞》的“副榜”一节，为读者做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。我认为现在编撰字书，有大量的古今字书，足资借鉴；取材引证，也比前人方便得多；不仅应该尽量做好解说，而且需要以各种方式充实内容，美化文字，以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，使人觉得闲时翻翻字书，也很有趣味，可以得到不少知识。这样就能打破以往字书只供检查、无人阅读的局面，而进入一个发展的新阶段了。

第二节 文字的变迁与字书的演进

文字的变迁和字书的演进，有着相应的关系。如字体之由篆到隶、字数之由少至多、字形之由繁趋简等，都对字书的编撰，有直接的影响。所以这里要简略地谈一下中国文字的变迁。

《易·系辞》上说：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言文字起源的，以此为最早，但这里并未指出后世造书契的圣人为谁。至战国末年，而仓颉造字之说流传，如《韩非子·五蠹》和《吕氏春秋·君守》就都提到“仓颉作书”，《荀子·解蔽》也有类似的说法。汉人述仓颉造字及其神怪传说者尤多。余如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，秦李斯作小篆，程邈作隶书；汉史游作草书，杜度作章草，张伯英作狂草；东汉末王次仲作楷书，又改隶字为八分，刘德升作行书等说法，都只能说明某些人参与了字体的统一整理、加工写定，其发明创造，不会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。

约略说来，由系绳扣这一最简单的记事方法前进一步，就产生了图画式的原始文字。其后迭经演变，才有所谓“古文”“大篆”。古文大抵为周宣王以前文字之通称。汉

武帝时，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壁中书，晋太康中汲郡民盗发魏安釐王冢所得竹书漆字，其字皆头粗尾细如蝌蚪形，即周时古文，称为蝌蚪文。大篆即周宣王时太史统一写定的文字，亦称籀文。

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，为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中国最古的文字，是清光绪年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，我们称之为甲骨文。这种文字已很完整，一个字往往有几种写法，基本上还是作画的形式。商周人（主要是周）铸刻在钟鼎彝器之上的文字，我们称之为金文或钟鼎文的，也是现在能见到的一种古文字，其形体笔画，较为圆浑，已显出一些书写的艺术，不像甲骨文出于镌刻的那样细削，但相差并不太远，一个字仍然有好多种写法，颇不统一。春秋时代，文字变化不大。到了战国，由于各国之间，地区隔阂，号令不一以及其他种种原因，文字的写法，就有了不少的差别：或对已有文字的形体笔画，改动增减；或因现实的需要，而创造出新字；各自为政，互不相谋，于是出现了“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”^①的局面。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，才整理写定以前的文字，使每个字大体上有了固定的写法。这种统一的文字，就叫作篆书。后来

① 见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叙。

也把商周的文字称为大篆或古籀，而把秦篆称为小篆。

在篆书通行之后，又出现了一种新字体，这就是隶书。因为这种字体最初只流行于民间，统治阶级对之非常轻视，认为它仅为徒隶贱民所用，故称之为隶书。最初这种字体，不过是篆书的一种草率的写法，但写起来究竟比篆书方便得多，于是使用范围不断扩大，到两汉而形体固定下来，完全脱离了篆书的范畴，成为与篆书并行的一种书体；跟着又进一步美化，变成汉碑上整齐美观的“汉隶”的样子。后来又把有波势挑法的那种隶字叫作“八分”，这也只是说明它的写法与一般隶字有些差别而已，依然是隶体。汉隶的出现，表明了中国文字之脱离象形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

隶书再演化，就变成草书和楷书。草书大约在汉初即已产生，本来只是隶字的一种草率的写法，为了适应书写简化的需要而创造的；随后又渐渐形成一种见棱见角四四方方的草体，叫作“章草”。草书与章草，遂成两体，但基本上还没离开隶书的范围。至于后来出现的几个字连在一起，龙蛇飞舞的狂草，就与隶书已全无关系，成为一种难写难认的艺术字，失去实用的价值了。

楷书又称“正书”“真书”，也是把隶书的写法加以变化修饰而成的，较草书稍晚出，在三国魏时已经通行。像魏钟繇

所写的“力命表”，形体方扁，仍具隶书的规模；晋王羲之所写的“黄庭经”，也带隶书的意味；足见早期楷书实际和隶书相去不远，所以又名“今隶”。到了唐代，楷书才变成长方形，像虞世南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欧阳询等所写的那样。从此楷书算有了定型，一直被认为法定字体。另一方面，大约在东汉末，随着草书的失去作用和楷书的出现，又产生了一种调合草书、楷书两体的“行书”，其笔画或连或断，基本上还是楷书的样子，易写易学也易认，使用甚为方便。同时由于楷书写起来也并不太省事，民间还创造出了比楷书笔画少的简体字，到南北朝时进一步流行发展，异体别字也不断滋生。清赵之谦所辑《六朝别字记》，就反映了当时文字变革的现实。

以后每个朝代，都有许多新的简体字出现，从前的简字、异体也大部分被承袭下来。虽然人民群众不断在创造简体字，每个时代的文字，亦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简化，但一个字有几种写法的，仍旧很多。如“亩”字就有“畎、晦、畝、𪛗、畝”五个异体字，“疊”字也另有“疊、疊、疊”三形。简体字的通行，并未能减少实际存在的字数。

概括说来，由于秦以来小篆的通行，就产生了东汉许慎所撰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对小篆做了一番整理，使之规范化。由于

魏晋以来，通行的楷书（今隶）已代替了小篆，就产生了南朝梁顾野王所撰的《玉篇》，全收楷体。由于南北朝时异体的复杂化和新字与简体的不断增加，到了唐代就产生颜师古所撰《字样》、颜元孙所撰《干禄字书》一类的字书，试图辨别正俗，考订古今字的异同。由于宋以来，出土的钟鼎等古器物较多，就产生了薛尚功所撰的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一类以解释钟鼎彝器的文字，这实际也是字书的一种。总之，历代各种字书的编撰，无一不与当时文字的演变以及文字训诂之学的研究等，有着密切的相应关系。

从总的方面谈，时代越靠后的字典收字越多。这一方面是社会进化文字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一方面也是字典编者收字范围逐渐扩大所造成。《说文解字》为讲经学而编，只取经典古籍的文字，所以仅有九千三百五十三字。从南朝梁顾野王的《玉篇》起，字数就多起来。后出的字典，总在前书的基础上增加不少新字。像《玉篇》原本只有一万六千九百多字，今本就有两万二千七百多字。宋司马光的《类篇》收三万一千三百多字，明梅膺祚的《字汇》比《类篇》多出两千字以上，明张自烈的《正字通》也差不多。清张玉书等的《康熙字典》则又增了一万多，共收字四万七千有余。近代的《中华大字典》字数较《康熙字典》还多一些。其实，真正常用的字，不

过五六千；即读古籍，亦用不了几万字。字书中的冷僻字，占着很大的比重。由于编者贪多好奇而滥收的根本没用的字，也有不少。

至于字书编撰的体例、方法，也是越到后来的越完善、越进步。比如字典的部首，《说文解字》分为五百四十个，实在过于复杂，多可合并；压缩为《字汇》的二百十四，再简化成现代字典的一百九十多，就是一种进步。今天的字书，除用部首排字法外，还有音序和四角号码等排字法，检查更为方便。在字形方面，《说文解字》只于小篆之下，列出古文或籀文。后来的字典，如《字汇》《康熙字典》，除去把古体、异体、俗体等，排在本字之下，使读者知其异同外，还列有难查字的“检字”表，形似字的“辨似”表，供查检之用。这也是一种进步。现在我们推行简字，整理异体；字典编者在书中的简体字后边，附列停用的繁体字；在选用的异体字后边，附列停用的异体字，亦为相应的必要措施。在字义方面，早期的字典，主要是用《说文解字》的“穴，土室也”这种“×，××也”的解释方式；后出的字典，才渐渐有了多样的解说，把一个字的本义、引义、喻义、转义等，辨析得较为精密。《字汇》和《康熙字典》已经注意到一字数义的排列顺序。今天的字书对于字词的本、引、喻、转等义，都分别举例解说，更为

清楚。字典解说文字的以前用文言，现在用白话，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字音的标注，则《说文解字》是用“读若某”“读与某同”取声近声同的字来譬况的方式；由《玉篇》到《康熙字典》，主要是用反切、以两字相切而成一音。如“东”字注“德红切”，即以“德红”两字相切，念出“东”音。还有的注直音，如“章”音“张”、“弓”音“宫”之类。有的以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相注，如“东”字本是平声，读上声即成“董”，读去声即成“冻”，读入声即成“笃”。这些方法，全有缺点，也较难掌握，不如近代用注音字母那样方便。现在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来拼音，就更进一步，可以使一般读者都很容易地读出正确的字音了。

古代词典的体例，比字书的简单得多；因为由汉到清的词典，主要是《尔雅》式的，都按内容分类。但这些词典分类既不够科学，每一类中的字词排列，亦无次序，查起来很不方便。直到清人编《佩文韵府》，采用“以韵统字，以字系事”的方法，在每一韵中的每一单字的下面罗列尾字和这一单字相同的词语，不再以内容分类，词书的体例才有了改变。现代词典如《辞源》《辞海》等按部首收单字，在单字下面罗列以这一单字为头的词语，又以词语的字数和第二字的笔画多少为先后次第，即承袭《佩文韵府》的办法而小加改变的。这已